

德國現代化新論

權力與自由

郭少棠著

商務印書館

郭少棠著



德國現代化新論

權力與自由

商務印書館

德國現代化新論——權力與自由

作 者——郭少棠

責任編輯——徐啓章

出 版 者——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觀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

印 刷 者——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B1

一 版 次——199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1992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6116 2

金耀基教授序

(一)

近幾年，由於學術的機緣，我有幸去過德國三次，有一次還到海德堡大學作研究四個月，並訪問了許多地方，特別是幾個著名的大學城。德國留給我深刻難忘的印象。當然，我所見到的是現代化的德國，是德人所謂“可慶喜的零年”後重建的民主自由之邦，是在戰爭的烈火中再生的一隻火鳳凰。許多德國人視一九四五年為由零開始，在世人面前宣告與希特勒的邪惡的第三帝國決裂，同時，他們也不願再回顧俾斯麥的虛榮的第二帝國。西德的締造者阿登納（K. Adenauer）在他的演說中，就從不提“過去”。可是，不須經心的，在德國我處處感到的是文化傳統的瀰漫，歷史的厚重。這種一方面要與“過去”告別，一方面又深深活在“歷史”中的現象，使我產生莫大的好奇。由於我對中國現代化問題長年的探索，更無法不對德國的現代化感到興趣。無庸諱言，我對德國現代化的瞭解是很初步的，不是系統性的。日前，中文大學同事郭少棠博士告訴我，他的《德國現代化新論——權力與自由》的長稿經已殺青，希望我寫一序言。我聽了

極為高興，不止是喜見少棠多年經營的著作已瓜熟蒂落，而且也是想先睹為快，因為他所寫的正是我有興趣的。郭少棠博士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畢業後，即赴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進修，攻讀歷史，旁及社會學，完成博士論文 *The German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the Search for Wholeness*，間中且曾到德國作研究，這部大著則是返母校後，在教學之餘，醞釀經年的研究成果。果然不出所料，少棠這本書視野闊大，論述嚴謹，對德意志的現代化提供了一個全面而系統的詮釋。就我寡聞所及，這可能是唯一以德國現代化為專題的中文論著，我更願肯定的說，今後研究此一課題的中國學者，將不能不參考此書。

(二)

郭少棠博士以“權力與自由”作為書名是富有精思的。“權力”與“自由”這兩個概念相當概括地展露了德意志現代化複雜過程中所追求的兩種充滿着內在衝突的目標與價值，兩股相生相剋的歷史力量；兩者也突現了德意志現代化充滿矛盾弔詭與緊張的歷程。應該指出的是，郭著所論德意志的現代化是以政治現代化為重心的。相對地說，德國在工業化或經濟現代化上是頗順利的，較少引起爭議的，反之，在政治現代化上則由於政治文化傳統所發揮的二元性格，而引致了二百年浪濤洶湧，一波三折的迂迴變化。誠如作者所說：“德意志政治現代化的歷史就如一幅豐富多彩的絢麗長卷畫面”，的確，在作者

討論的“維新篇”、“革命篇”、“統一篇”及“災劫篇”中，所分析的現代化的四個“浪潮”，展示了浪漫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風起雲湧的一幅絢麗長卷。作者對現代化四次運會之浪起、潮落的剖解，結合了不同時期文化觀念與意識形態之變遷起伏的細繹，有結構，有條理，落墨濃淡都有分寸。特別是他把政治與文化交光互影的處理，生動地點出了政治文化傳統在現代化中的張力和韌度。

(三)

本書綜論德意志現代化，但少棠把重心放在文化傳統與現代化的相生相剋的動態關係上，這在他書中前言“傳統與現代之間”一開始就點明了。誠然，不瞭解德國的文化傳統是無法理解德國之現代化的。很少民族像德意志人那樣崇尚傳統，那樣強調“德國性”(Germanness)，那樣誇張“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和文化的民族主義。少棠對這點看得很透徹，他正文的首篇即名為“傳統篇”。他指出“古老帝國的歷史包袱”，並以“啓蒙的洗禮”和“狂飆的奠基”二章析述德意志文化傳統的成型。戈洛·曼(Golo Mann)在他的《一七八九年來的德國史》(*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中指出，神聖羅馬帝國是德意志歷史中的基本因素，德意志人之所以感到優越即因他們認為帝國是屬於他們的，只有他們才承繼了羅馬播揚文明的使命。反之，德意志人之所以感到自卑，正正因為帝

國事實上不過是一大堆沒有歷史使命的小公國，遠不如西方的民族國家生機蓬勃。曼說：“帝國的記憶延緩並阻礙了德意志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到頭來，這種帝國的記憶幫助了民族國家的建立，卻又使其變了形。”少棠指出“神聖羅馬帝國的封建體制為德意志民族留下難以清洗的傳統烙印：一種自卑的情意結，一種‘雙重性’的權威觀念（既是專制的，又是開明的）和自由觀念（自由中又包含有不自由的倚賴性）。”正因為德意志有這樣的文化基因，因此，德國對於開啓歐洲現代化序幕的啓蒙運動也有與英、法完全不同的反應。少棠說：“‘雙重權威’、‘雙重自由’等觀念在康德與黑格爾的思想體系中，改變成既尊重道德的自我和宗教的信仰，又服膺於政治權威；既肯定個體內在的自由，又接受權威的存在與保護。”美國的德國史學者克雷格（G.A. Craig）認為啓蒙主義的觀念，如天賦自由、平民主權等從未在德國生根。換言之，啓蒙運動在德國是失敗了。啓蒙的“世界主義”雖然在萊辛（Lessing）、席勒（Schiller）等人身上有過優美的表現，但最後在德意志土地上勝利的還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觀念之所以興起，固然有賴於導引狂飆運動的赫德（Herder）對民族歸屬感作出頌揚，但拿破崙之征服德國，把普魯士、奧地利等降為衛星地位之羞辱，才激發了菲希特、黑格爾等哲人熱情地擁抱民族與國家，國家在黑格爾手中更進一步被理想化為集體生命的萌芽。少棠對於這個知識傳統的演變有這樣的看法：“從路德至狂飆運動，近代德意志民族主義在文化（尤其文學）上

取得最先的突破。文化和民族在這次突破之中結合起來。這兩個深深地影響後來德意志政治發展的名詞，相互蘊藏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四)

如前所述，郭少棠博士此書的重心是論述德意志的政治現代化。他認為，政治現代化的歷程以民族國家的建立為最基要。我們可以說，德國政治現代化的中心問題就在於如何由帝國型態轉化為現代的民族國家型態。在這裏，少棠很強調地指出來，民族國家的建立包括三個階段的發展，即民族解放、民族統一與民權的建立。他說：“德意志民族在擴展民族國家的歷程中，同時發展和爭取自由與民主，實際上是致力貫徹民族國家的最後目的——民權的建立。”從德意志歷史的經驗中，他有這樣的判斷：“民族國家的鞏固基礎在於民權。一日民權未能真正確立，民族和國家都沒法取得完整的協調。”我們知道，德國的問題正在於民族的統一和民權的建立之間難予契合。鐵血宰相俾斯麥的統一，完成的是帝國的霸業，和一個虛假的民主體制。及至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固然是把民族主義推到了頂峯，卻也把民主自由貶壓到踪影不見，這就是“權力”壓倒了“自由”。近代許多國家，包括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就正出現了“國家”壓制“個體”，“集體理性”壓倒“個體理性”的困境，使政治現代化無法真正體現。德國受過啓蒙運動的洗禮，但傳統的土壤，一直到一九四五年，都沒有讓啓蒙的理念開花結果；中國在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也接觸到了象徵啓蒙的科學與民主，但科學變成了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民主則不是流產便是變了形。當然，這與中國的文化傳統脫不了關係，可是，在五四激進的批判運動內，文化傳統遭到了生吞活剝的全面打倒，這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反理性的。今天我們越來越明白，古老的文明，如中國與德國者，其現代化是不可能把傳統一筆勾銷，是不可能在一張白紙上任意描繪的，而必然是經由傳統的轉化，特別是傳統與現代之結合交輝才能獲得生命力的。這一點，少棠在柏克萊的業師社會學者班狄克斯（R. Bendix）是一再致意的。他強調西歐的社會演進，蘇俄、日本、印度的發展，無一不是傳統與現代的互動與互應。他所作德、日之現代化的比較研究，充分顯示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相生相剋的種種可能。郭少棠博士此書，正演繹發展了班狄克斯的觀點。少棠說：“把歷史發展的洪流強行分別為‘傳統’與‘現代’兩個部分，既抹煞了歷史的延續性，亦漠視了歷史演進的潛能”，這個說法，我是深為贊同的。

（五）

郭少棠博士是一位對中國前途念茲在茲，無刻或忘的有為之士。他此書寫的固然是德國的現代化，但他心中同時關懷的是中國的現代化。他深切體會到文化傳統對德意志現代化的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他有這樣的情懷與企圖心，他說：

作為一個中國背景的歷史研習者，作者深切地體會

到文化傳統的沈重包袱，更關注這個歷史包袱為何構成現代化的一種無形負擔。本書既希望以中國人對歷史傳統的觸覺去反省德意志文化與政治現代化的微妙的歷史經驗，最後亦嘗試提出一些中、德比較現代化經驗與讀者分享。

少棠在本書結論一章中，不但分析了德意志在第三帝國廢墟烈火中“火鳳凰後的新生”，也提出了不少獨特的中德政治現代化的比較看法。我在此無意一一引述或評斷他的論點，相信讀者必會有自己的體會與反應。總的說，此書內容富贍，引證翔實，是一部態度嚴肅而文筆生動的學術論著，而我最欣賞的是作者的識見。少棠是“後五四”的一位年輕歷史學者，他的識見，特別是他對文化傳統在現代化中的作用的詮釋，是絕對“後五四”的。這部論著，我相信，正如作者所期望的，可以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之現代化問題有一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啓示，並可以為中德比較史研究提供一個好的起步點。

☆金耀基教授乃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

劉明翰教授序

一直以來，德國史的研究在中港台並沒有太顯著的發展。有關德國的論著，以純文學或哲學的研究較多，史學的著作相當貧乏。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方針的指引下，全國性研究德國史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德國史研究會在一九八〇年八月成立。該會曾先後舉辦了四次全國性研討會（分別在青島、哈爾濱及武漢），有近二百多篇學術論文相繼發表。該會亦曾選擇部分文章，輯成論文集出版。

這些著作與研究的範圍比較傳統，配合國內過去的趨向，集中在社會、經濟與政治運動，而文化史、社會科學或跨學科的研究則較少。文化史通論性著作較具代表性的是杜美教授的《德國文化史》。除此之外，專題性著作可謂絕少。

台灣在研究德國文化方面，仍然以文學、哲學和史學史題材為多。專題性研究的情況與國內相差不大。因此結論是，以較新的課題、觀點、資料和方法寫成的專著極為缺乏。

最近，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郭少棠博士寄來他的新作《德國現代化新論——權力與自由》，給我一個驚喜。可以預言，這本專著將在中國人研究德國史以至世界史的領域上獨辟蹊徑，在這片空白的學術園地，播下一些重要的種子。

此書自成體例，是一部溯自神聖羅馬帝國時代起，一直到納粹第三帝國滅亡為止的政治文化思想史，系統、深入地評析了德國的文化傳統以及德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四次浪潮。

作者沒有單純敘述歷史，而是推古驗今，史論結合。本書對德國民族和國家的特徵，對德國啓蒙思潮，狂飆突進運動，以及政治文化的現代化等重大課題，均有專題探討，將史實結合理論進行解剖。對德國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悲劇性發展，更列為重點加以論述。全書框架鮮明，邏輯嚴謹，重點突出，是一部別具風格的史論型著作。

書中沒有孤立地研討文化，而是善作縱橫比較。它既分析了傳統與現代化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又論及德國文化傳統的現代化同繼承之間的具體動態關係。更可貴的是本書經常將德國與中國加以歷史的橫向比較，在縱橫的對比剖析中，大大廣闊歷史的視野和想象，現實感極強。

本書賦予“政治文化”以特定的內涵和意義。書中廣泛地剖析政治文化形成的經過和所受的影響，指出政治文化的特點及其複雜性。作者不同意許多歷史學家論析

政治文化時過分簡單化的傾向，結合德國的史實，精辟地提出了德意志民族國家形成的三個歷史階段：民族解放、民族統一和民權的建立。

全書以思想史為主導，又沒有局限於宗教、文化和社會思潮的範疇，經濟、政治和典章制度等仍佔有相當的比重。作者將社會經濟和思想制度的沿革作整體的討論，強調基礎同上層建築之間的有機聯繫和相互作用。

本書立論客觀，思維方法辯證。如一方面指出德國傳統文化的社會意義，另一方面又深入分析其局限性；既關注德國自由主義者的歷史作用，又揭示了他們的失敗原因。本書也嚴格地劃分了德國傳統文化同納粹政權之間的原則區別。

總括言之，郭氏的著作表述了一家之言，提出的見解和論點讀來很受啟迪，為國人瞭解德國人及其歷史文化必不可少的一本參考書。

☆劉明翰教授乃前山東大學歷史系德國史教授，現任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常務理事長，中國德國史研究會理事。

自序

中華文化往何處去？中華兒女如何繼承與開展數千年的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如何現代化？

爲了探索這些問題，我先後踏進香港中文大學與柏克萊加州大學的門檻，學習比較歷史與文化。記得加州大學德國史家 Wolfgang Sauer 教授曾帶着點好奇地問我關於選題或立論的標準，因他察覺我的論點與角度跟其他美國研究生不一樣。我告訴他，我一直抱着中國與其他文化比較的角度來觀摩歷史。我的另一位導師 Reinhard Bendix 教授，以研究 Max Weber 和比較現代化著名，他也經常蠻有興致地問及我對中國與歐洲比較現代化的看法。此外，杜維明教授及 Franz Schurmann 教授亦就中國現代化的經驗追問我的比較史觀點。他們以寬廣的胸懷，不單願意聽取一個來自萬里以外的中國學生粗疏的意見，還給予他很多鼓舞和批評。他們的諄諄教誨，使我不由得緬懷中文大學的良師王德昭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和孫國棟先生。

過去十四年，除了埋首中文大學的教研工作，我一

直耐心地整理多年學習與研究的成果。比較歷史要求研究者對比較的兩方面均有精深的認識，在此基礎之上，反覆辯證及推敲。雖然我曾多次訪問歐洲，尤其兩次在德國旅居了一段時期，但自覺對歐洲文化的感性認識還未夠深入和全面。本書出版之時，適值是我進入加州大學二十周年；書中所述，亦可算是總結這二十年研習德國史的初步心得。僅以此書獻給柏克萊的幾位老師：杜維明教授、Wolfgang Sauer 教授、Reinhard Bendix 教授、Franz Schurmann 教授及 Fryar Calhoun 教授。

最後，金耀基教授和劉明翰教授於百忙中抽空為我作序，商務印書館陳萬雄先生和徐啟章先生多年督促和仔細的編輯，曹曉霞、林國輝、陳志輝等同學編製索引，除在此一併致謝之外，更希望日後對比較歷史和文化作更多的研究和貢獻，以報答師友的愛護和支持。



傳統向現代不絕地發出回響。

前言

傳統與現代之間

自 俄國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發明“西化”（Westernization）的概念^①，“西化”的討論在歐洲一直延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戰之後，逐漸取而代之的論題是“現代化”（modernization）。這個源自蘇聯三十年計劃經濟的名稱（類似日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其後被歐美學術界借用並修改成現代社會形成和發展的模式^②。

六十和七十年代歐美學術界掀起探討現代化的熱潮，起始的動機是尋求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原因，後來逐步轉向關心先進國家的“後現代”問題。這時期討論“現代化”的文獻極其豐富，對“現代化”的理解亦相當紛紜^③。期間產生的相關概念包括“反現代化”（anti-modern）、“現代性”（modernity）、“傳統性”（tradition）、“反傳統”（anti-tradition）和“後現代”（post-modern）^④。“現代化”的範疇被劃分為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四大部分。

綜觀過去三十多年有關現代化的討論，雖然未有產生